

经济学家

中国面临改革与增长的艰难平衡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在这里,马克思又认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而且是人类的抽象劳动,它生产和增值价值,资本家看中的正是这样的劳动力使用价值。如此看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同于物的使用价值的地方是,它具有两重性的使用价值特征。

《资本论》学习体会之三

在这里,马克思又认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而且是人类的抽象劳动,它生产和增值价值,资本家看中的正是这样的劳动力使用价值。如此看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同于物的使用价值的地方是,它具有两重性的使用价值特征。

对另外一个人作用不大或者没有作用。生产资料对生产者来说是有用的使用价值,而对消费者来说则是无用的使用价值。即便是同样的生产资料,对有的生产者是有用的,而对另外一些生产者则可能是没有用的。如果仅仅把物的使用价值理解为客观存在的物,上述现象恐怕难有合理的解释。人的主观性和物的客观性对使用价值来说,历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那就是物的有用性,是相对于人的需要、评价和认可而言的,物的使用价值体现的是人和物的关系。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能否像物的使用价值那样定义为劳动力的有用性呢?从马克思关于物的使用价值是由具体劳动生产出来的,具体劳动就是有用劳动的认识来看,似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可以被认为是劳动力的有用性。但是,马克思又有这样的论述,“劳动力的占有者提供他的劳动,实际上只是提供他已卖出的使用价值,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资本论》第一卷 210 页)。在这里,马克思又认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而且是人类的抽象劳动,它生产和增值价值,资本家看中的正是这样的劳动力使用价值。如此看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同于物的使用价值的地方是,它具有两重性的使用价值特征。不同于物的使用价值表现的是人和物的关系,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表现的却是人和人的关系,这是因为劳动力本身从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人与生俱来的,离开人就不能独立存在的东西。劳动力使用价值离开人就不能独立存在的特性,衍生出另一个不同于物的使用价值的地方,那就是前者具有不稳定的性质,后者一经生产出来就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

“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劳动和智力的总和”(《资本论》第一卷 195 页)。就是说,劳动力从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人的先天和后天形成的东西,它存在于人的活的身体中,不能离开人而独立存在。所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受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的影响和制约(当然,思想和精神也可以认为是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内容但又不尽然)。人的思想境界高,精神状态好,他在劳动中发挥的劳动力使用价值就大;思想境界不高,精神状态不好,他在劳动中发挥的劳动力使用价值就不可能很大。思想与精神的状态,影响和决定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稳定性。人具有政治性,同时也具有经济性,政治性体现在思想与精神上,经济性表现在利益追求上。较高的经济利益有利于调动劳动积极性,发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较低的经济利益或者没有经济利益,则不可能长时期地调动劳动积极性和发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更有甚者,如果思想与精神处于一种叛逆状态的话,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仅难以发挥出来,而且还有可能形成破坏作用,工人不满资本家的剥削而破坏机器的行为就是例证。所以,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稳定性,不只是影响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也影响财富的创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我国,无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用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用的经济利益杠杆和加强劳动管理,都是为了克服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稳定性。

辩证地认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现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就劳动力使用价值的两重性来说,它一方面表现为劳动的有用性,即有用的劳动才有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劳动的抽象性,即能生产和增值价值的劳动才有使用价值。曾经,我们对基于劳动有用性的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研究太少,而对生产和增值价值的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研究不遗余力。我们认为,对于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研究,既要分析基于生产和增值价值的劳动力使用价值,也要探讨基于劳动有用性的劳动力使用价值。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基本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认为研究基于劳动有用性的劳动力使用价值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了。例如,当前党和政府提出新时期创新创业的政策主张,其理论含义是什么,就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创新就是创有用劳动之新,创业就是创有用劳动之业,因为没有有用劳动之新,没有有用劳动之业,就不可能出现创新创业的大好局面。更何况,不提倡有用劳动的创新,导致的结果就可能是无用劳动,因为有用劳动的不断重复也就可能变成无用劳动。如果说在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大众需要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产品短缺的情况下,提倡或不提倡有用劳动的创新,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还不是很大的话,那么,在生活资料能够满足人们大众的需要,而且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提倡或不提倡有用劳动的创新,就是一个事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了。这个过去我们不太重视的劳动力使用价值的有用性定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意义和作用就是非常重要和深远的了。至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能够生产和增值商品价值,能够揭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马克思的论述就是非常经典和深入的了。不过,我要强调的一点是,资本家固然非常重视生产和增值商品价值的劳动力使用价值,同时也非常重视能够创新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和生产资料使用价值,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力使用价值。当

劳动力价值大幅度提高从而劳动报酬提高的时候,他都是通过有用劳动的创新即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创新来改良劳动工具,提高劳动生产力和相对剩余价值而获得超额利润。

劳动力使用价值因为其不稳定性而难以充分发挥,这是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关注和研究的问题。马克思眼中的资本家为了确保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稳定性,采取野蛮和不人道的管理方式,通过监工鞭挞劳动者,按照既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例如计件工资)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即使如此,工人也以资本家始料不及的方式破坏生产。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基本上也是采取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的方式管理劳动者。但是,我们应该否定《资本论》中描述的那种资本家野蛮和不讲人道的管理方式。应该引进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使劳动者能够在一种思想愉悦,精神放松的状态下工作,以充分释放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当然,我们也需要把经济利益和人性化管理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宣传教育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以调动和发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由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具有多元化的性质,既有体力劳动的使用价值,也有脑力劳动的使用价值,因此,不能运用一种管理制度就能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使用价值都充分发挥出来。现在,我国的教育部门和科技部门基本上是学习西方国家管理体力劳动的方式来管理脑力劳动。所谓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就是以量化指标对生产过程中的工人进行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对于体力劳动来说,能出千篇一律的标准化物质产品,而对于脑力劳动来说,似乎也能像物质产品一样出千篇一律的成果,但却难以出思想性和创新性的精神产品。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一种有思想性的使用价值,因为它注入了人的灵魂,这是我认为它既具有不稳定性,又能够出思想性成果的重要原因。所以,管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尤其是脑力劳动的使用价值,要十分注意它是一个有思想性的,善于钻制度空子的有灵性的东西。一种好的制度安排,能使脑力劳动的使用价值迸发出创新性的思想火花;一种不好的制度安排,有可能使它滋生不良的寻租行为。就我的认识来说,量化指标管理就是那种难以使脑力劳动的使用价值迸发出思想火花,却很有可能导致不良寻租行为的制度安排。有关这个问题,学界已有不少人作了精辟论述,也不是我三两句就能够讲清楚的。如果用一個通俗的比如,倒能把它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一种好的制度安排,能使坏人变成好人;一种坏的制度安排,能使好人变成坏人。

事实上,央行同时兼顾了“汇率贬值派”和“汇率维稳派”的逻辑和政策建议,努力在两个逻辑之间寻求平衡,在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之间,在内部经济和对外经济之间进行动态权衡。平衡和权衡的结果就是本文提到的“双锚相机转换机制”。

考虑到政策约束以及央行政策沟通的技巧,“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这句话背后蕴含着字面意思更为丰富的信息。透过这句话,政策制定者至少希望向外界传递出三层意思:

首先,对中国经济有信心。汇率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所以人民币汇率不具有持续性贬值的基礎。其次,不具有持续贬值的基礎,并不意味着短期的、小幅的贬值不会出现。最后,这个事情是可以谈的。

如果说第一层意思和第二层意思主要是说给公众和国内外金融市场参与者听的话,那么第三层意思主要是针对外国政策制定者,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说的。而且,汇率短期走势很可能会取决于双方谈的怎么样。

人民币汇率的“双锚相机转换机制”

冯明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人民币汇率无疑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和全球金融市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对人民币汇率的讨论既离不开其背后相对生产率变化、经常项目、国际资本流动等基本面因素,也离不开对汇率形成机制这一政策面因素。特别是在短期,政策面因素的重要性往往更为凸显。

按照人民银行的表述,今年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并不复杂。其核心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在 2015 年 8 月 11 日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二是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开始,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始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保持一篮子汇率基本稳定。

不过在现实操作中,汇率形成机制远比上述两点原则复杂得多,主要原因在于兑美元汇率和兑一篮子货币汇率这两个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

从技术层面来讲,我们可以将 8.11 之后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简单表述为“双锚相机转换机制”。简言之:人民币汇率以美元或者一篮子货币为参考,是为“双锚”;在某一特定时段内,选择两者之中更弱的一方为锚,是为“相机转换”。

例如,2016 年 2 月初到 4 月底,美元处于走弱阶段。在这段时期,人民币以美元为锚,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稳定(略有升值但幅度不大),从而结果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有效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调。再如,整个 5 月份,美元呈走强态势。这时,人民币以一篮子货币为锚,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有效汇率基本保值稳定(略有升值但幅度不大),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贬值。又如,6 月 24 日之后的几天,受英国脱欧公投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升。这时,人民币选择盯住一篮子货币,而对美元汇率贬值。

可以说,“双锚相机转换机制”是政策制定者在灵活自主的汇率政策和现实政策约束之间进行巧妙权衡的结果,是一条中间道路。

学术界在 2015 年以来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声音非常多元化,但主流的声音大致可以归纳为两派观点:

一派观点认为,人民币名义汇率处于高估状态,应当贬值;更有人提出了一次性大幅贬值到位的观点。另一派观点认为,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大环境下,大幅贬值容易引起资本外流和金融市场震荡,当前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首要任务是维持汇率稳定,汇率的窗口期已经关闭。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前一派观点称为“汇率贬值派”,将后一派观点称之为“汇率维稳派”。

两派观点可谓针锋相对,都建立在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之上,但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也都有弊端。这充分反映了 2015 年 8 月之后新一轮汇改所处的复杂背景。首先,新一轮汇改是在全球主要国家经济周期不同步、宏观经济政策不协调的大环境下展开的。第二,由于金融深化,政策变量和市场内生变量之间的联动更为敏感。第三,中国经济和汇率政策受到国外主要经济体和国际资本市场的空前关注,外溢效应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事实上,“8.11”汇改之后和央行在 12 月宣布参考一篮子汇率之后,美国欧洲股票市场、大宗商品市场以及黄金价格都随即发生了较大幅度的震荡。

学术讨论可以假设、演绎,甚至为了强调核心逻辑可以对模型做出简化和抽象;但是央行作为决策者,则必须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进行理性决策。特别是当面临难以承受之风险时,即便出现“坏的情况”是小概率事件,也往往不得不做出风险厌恶的决策。

“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这是去年以来官方提及汇率政策时说到最多的一句话。如果对国内外经济大环境以及政策约束缺乏理解的话,那么从这句话

中得到的信息就会很简单——政策当局采纳了“汇率维稳派”的观点,人民币不会贬值。如果带着这一信息心领神会地去进行投资决策,那么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显然会接二连三地碰壁。

事实上,央行同时兼顾了“汇率贬值派”和“汇率维稳派”的逻辑和政策建议,努力在两个逻辑之间寻求平衡,在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之间,在内部经济和对外经济之间进行动态权衡。平衡和权衡的结果就是本文提到的“双锚相机转换机制”。

考虑到政策约束以及央行政策沟通的技巧,“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礎”这句话背后蕴含着字面意思更为丰富的信息。透过这句话,政策制定者至少希望向外界传递出三层意思:

首先,对中国经济有信心。汇率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所以人民币汇率不具有持续性贬值的基礎。其次,不具有持续贬值的基礎,并不意味着短期的、小幅的贬值不会出现。最后,这个事情是可以谈的。

如果说第一层意思和第二层意思主要是说给公众和国内外金融市场参与者听的话,那么第三层意思主要是针对外国政策制定者,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说的。而且,汇率短期走势很可能会取决于双方谈的怎么样。